

养老保险费率下降、缴费遵从度与 企业异质性反应 ——基于全国税收调查的微观证据

赵绍阳 余楷文 周博¹

【摘要】“减税降费”有利于纾困中小企业和稳定就业，也有利于形成全覆盖和可持续的社保体系，还能够有效促进共同富裕。对过往养老保险降费政策进行科学评估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浙江省出台的基本养老保险降费政策为切入点，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全面评估了降费对企业的参保行为、人均薪资、雇佣和投资水平的影响。本文稳健地发现降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缴费遵从度这一途径对企业的参保行为产生影响。一方面，降低政策缴费率使得企业参保遵从度上升，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和大中型规模的民营企业；另一方面，降低政策缴费率对企业人均薪资和投资水平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国有企业雇佣了更多的职工而非国有企业提高了职工工资和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表明，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可以大幅增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有稳就业、促投资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减税降费 遵从度 雇佣人数 投资水平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21)09-0066-14

一、引言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科学认识减税降费的作用，加大社保的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对于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在 2019 年实施了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又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出台一系列为企业纾困的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化解企业间税收负担不均衡等问题。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可以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缓解企业流动性紧张，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座谈会上重申“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要继续减税降费”。在“双循环”新格局中，更要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对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保障就业稳定、助力双循环畅通的重要作用。

在减税降费等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下，即使外部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增长仍保持在 6%以上，减税降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降费前，中国企业的缴费比例明显高于同期 OECD 国家，使得其面临着高额的运营成本，“五险一金”的总费用占到了企业职工工资的 41%，见表 1。

表 1 2019 年前的社会保险政策缴费率水平 单位：%

¹**作者简介**：赵绍阳（1983-），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电子邮箱：zhaoshaoyang@scu.edu.cn。

余楷文（1995-），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通讯作者）。电子邮箱：she2120269@163.com。

周博（1996-），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电子邮箱：2819493125@qq.com。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老年人医疗保障、医疗支出与储蓄问题研究”（71773080）。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	工伤保险	合计
企业缴费比例	20	6	2	1	1	30
员工缴费比例	8	2	1	0	0	11
合计	28	8	3	1	1	41

注：企业缴费比例的基数为上一年度本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员工缴费比例基数为本人缴费工资，不低于本地区社会平均工资的 60%，不高于本地区社会平均工资的 300%。

那么，此次基本养老保险降费的执行效果如何，政策落地后能否真正促进微观主体活力？在降费的背景下，科学评估过往的降费政策的效果有助于持续完善和优化目前的降费政策。一方面，高昂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使得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度较低，不利于构建全覆盖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高昂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加重了企业的经营压力。目前，降费政策能否提高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率，激发企业活力，是目前急需回答的问题。

本文使用 2007—2011 年全国税收调查的微观企业数据，研究 2008 年 11 月浙江省出台的社保降费政策效果以及企业的异质性反应，以探究基本养老保险降费的效果。本文将从政策缴费率变化如何影响企业参保行为、工资水平、雇佣情况和企业投资，并探讨具体路径和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的不同影响，希望为促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启示。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基于 2007—2011 年的“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更全面地考察了浙江省企业在面临政策缴费率下降这一冲击时其社保负担的变化情况及其路径，并检验了该政策冲击对企业人均薪资、雇佣水平和投资的影响。现有的文献主要关注于税收改革对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1]本文则关注社保降费对于企业参保行为和生产经营的影响。（2）区别于宏观层面的研究，本文通过微观企业的数据更加精准地量化了降低社保缴费率对企业的影响，利用 2008 年 11 月的降费政策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缓解了降费政策的内生性问题，更好地识别了因果关系，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增强了结论的可信度。（3）本文还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在面临社保降费政策冲击时的异质性反应进行了翔实的研究，这对当前“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评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提供了实证基础。

二、文献综述

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保缴费率过高，从而给职工和企业带来巨大的压力。苏中兴(2016)统计了世界主要国家的社会保险费率，发现中国雇主承担的费率远远高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各国，分别为金砖国家的 2 倍、北欧五国的 3 倍、G7 的 2.8 倍、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的 4.6 倍。^[2]Feldstein 和 Liebman（2006）指出，中国的社保缴费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严重阻碍了社保体系的可持续运行和经济发展效率。^[3]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征管逃避、职工薪金、企业经验绩效和企业生产效率等角度讨论社保缴费率带来的影响。

（一）社保负担与征管逃避行为

当法定社保缴费率过高时，企业的用工负担会增加，从而引发其逃避社保征管。封进（2013）发现，随着法定缴费率的增加，企业的实际缴费率呈现先上涨后下降的趋势，并且在超过一定临界点后企业开始逃避社保缴费。^[4]赵静等（2018）发现，较高的政策缴费率使得企业的参保概率和缴费水平下降。^[5]金刚和范洪敏（2018）利用深圳市 2006 年政策缴费率的调整发现，在一定幅度内，政策缴费率的调整对企业实际缴费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6]目前企业逃避社保征管的方式大致分为三种：第一，完全不为职工缴纳社保；第二，虚报职工人数，为部分职工缴纳社保；第三，采用低报薪金的方式降低缴费基数从而不足额缴纳社保。^[7]

企业的异质性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面对较高的社保负担时的反应。周小川(2000)认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对社会保障供款率提高的反应不同,劳动密集型企业对社保负担增加的反应更加敏感。^[8]封进和张素蓉(2012)基于上海的社保制度差异发现,降低社保缴费率可以提高企业的参保程度,并且在平均人力资本较低的企业中影响更大,在人力资本较高的企业,低缴费率的政策对提高参保程度影响并不显著。^[9]赵静等(2018)发现,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逃避费倾向更强,同时,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企业的逃避费行为更严重。^[5]企业逃避社保征管行为还与地方政府监管力度的密切相关。伍青生和钟展(2010)通过对长三角用工企业的调查发现,政府的正向和负向激励均可以有效地增加企业为农民工购买社保的意愿。^[10]

（二）社会保险与职工薪金、福利

从职工的角度出发,现有文献主要讨论了较高的名义缴费率如何影响职工薪金和福利,社保缴费在企业和职工间的分担情况,以及企业在面临较高的社保负担时如何转移成本。名义社保缴费率的提高会挤出职工的薪金和福利,降低企业参保概率和职工的当期可支配收入。马双等(2014)研究得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其职工薪金和福利减少0.7%,企业雇用人数将减少0.8%,且社会养老保险未使得企业在职工工资与福利之间转换。^[11]赵健宇和陆正飞(2018)发现,较高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增加了企业劳动力成本支出占收入的比重,降低了员工当期可支配收入,导致创新的下降。^[12]

企业社保缴费并非由企业完全负担,而是通过减少雇佣,降低工资等方式转嫁至职工。钱雪亚等(2018)指出,企业实际承担的社保缴费率越高,其雇员工资越低,雇佣规模越小。^[13]参加社会保险对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在很多情况下企业并不能将社会保险缴费完全转嫁给员工。^{[14][15]}对中国的研究也表明,企业的缴费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承担,企业承担其中的30%~80%,因此,缴费率越高,企业欠费动机越强。^[16]

（三）社会保险与企业创新

社保的本质是政府向企业和在职劳动者强制征收的一种社会保险税,用以保障退休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支出。税负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现金流水平和融资能力。现金流紧张且受到较大融资约束的企业对税收的变化更为敏感。在经典文献中,霍尔和乔根森(1995)认为,当内源融资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时,税负的增加会减少企业的创新活动。^[17]在最近的研究中,Benzarti等(2019)估计了社保降费对企业活动的影响,他们对芬兰2011年社保改革的研究发现,社保降费显著增加企业的投资行为并对不同年龄的公司有异质性影响。^[18]

（四）社会保险与企业生产效率

社会保险还可能通过职工收入、雇佣水平和要素替代等方式影响企业生产效率。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这种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更高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不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Huffman等(2007)发现,美国的劳动保护法令通过增加企业解雇成本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19]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构成了一项重要的现金流支出,而现金流的约束抑制了企业对新技术、新方法的改进,^[20]从而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21]当期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导致员工对企业满意度以及自身努力程度的下降。^[22]这两点因素导致企业生产效率的损失。另一方面,养老保险缴费给企业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压力也可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较高的社保负担迫使企业增加资本要素的投入,减少劳动力的投入从而加速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23]

三、政策背景与模型设定

（一）政策背景

2008年降费前浙江省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主要由以下两个政策文件确定。第一,根据浙江省劳动厅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转发《关于印发〈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审批办法〉的通知》(浙劳险[1998]142号、浙财社[1998]24号),浙江省各市(地)

的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缴费比例由地方提出，并由省上批准，且比例一般不超过 20%。第二，根据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调整原行业统筹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通知》（浙劳社老[2003]59 号），该文件要求“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浙江省原行业统筹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统一为 20%。”该文件主要针对原行业统筹企业。^①该类企业原本缴费率普遍低于 20%。由此推测，在 2008 年 11 月下调基本养老保险前浙江省全省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大约在 20%。

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有关工作的通知》（浙政发[2008]70 号）实施后，2009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显著下降，所有地级市缴费率比例均不高于 16%，最低达到 12%，如图 1 所示。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变化，2009—2011 年浙江省部分地市对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其中杭州市和嘉兴市各下调了 1%，其余地级市不变，总体调整幅度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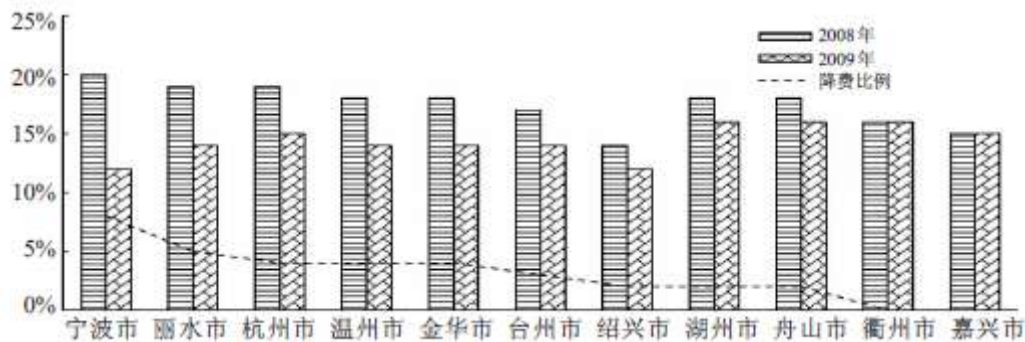


图 1 2008 年、2009 年浙江省各地市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

资料来源：浙江省各地社保局。

本文在对照组的选取中主要考虑了以下三点：第一，对照组地区应和浙江省的经济结构异质性较小，以保证两者之间的可比性；第二，对照组地区企业社保缴费率需在样本期间（2007—2011 年）不变，以评估 2008 年浙江省降费的影响；第三，对照组的社保费用征收机构应该与浙江省一致。刘军强（2011）认为，税务部门征收的参保率和遵缴率均高于社保部门征收情况。^[24]在经济结构异质性方面，李永友（2009）认为，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都处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经济结构异质程度较小。^[25]但是，浙江省企业更趋近小型化，以 2006 年的资产规模为标准，山东工业企业的小型化程度比浙江低 20 个百分点，^[26]并且本文所研究的样本以中小企业为主，故山东省企业不适合作为对照组。其次，广东省内的社保缴费率差异大，不同地级市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同一地级市的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之间也存在差异。因此，广东省虽然在经济结构上与浙江省相似，但由于省内企业缴费率差异巨大，亦不适合作为对照组。最后，我们发现江苏省 2007—2011 年省内各地级市缴费率较为统一且变化较小，经济结构与浙江省较为类似，并且浙江省和江苏省在样本期间都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26]因此我们使用江苏省作为对照组，构建双重差分对 2008 年 11 月浙江省社保降费进行政策评估。

（二）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的政策梳理，我们发现江苏省的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在 2007—2011 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稳定在 20% 左右，而浙江省在 2008 年 11 月后出台了降费政策，平均政策缴费率从 17% 下降至 14%，绝对缴费率下降了 3 个百分点，相对降费前下降了 17.6%。我们将实验组设定为浙江省，对照组设定为江苏省。双重差分模型要求实验组和控制组平行趋势成立，我们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政策发生前两个地区的企业在参保率以及经营状况指标方面具有基本相似的趋势，满足双重差分模型使用要求。

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Y_{i,t} = \alpha_0 + \alpha_1 \text{Treat}_i + \alpha_2 \text{Post}_t + \alpha_3 (\text{Treat}_i \times \text{Post}_t) + \beta_4 X_{it} + \epsilon_{it}$$

其中， $Y_{i,t}$ 是可能受到 2008 年 11 月降费政策影响的变量，包括企业的参保概率、实际缴费率、雇佣人数、人均薪酬和固定资产投资率；当样本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时， $\text{Treat}_i=1$ ，当样本企业注册地在江苏省时，为 $\text{Treat}_i=0$ ；当样本企业出现在 2009 年及之后时， $\text{Post}_t=1$ ，否则=0； X_{it} 是一系列包含公司特质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融资成本、现金流、是否存在出口业务和企业所有制；本文还控制了行业、年份和城市变量以控制特定行业周期、特定年份中宏观经济冲击和城市区位对降费效果的影响。

四、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使用“全国税收调查”2007—2011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该数据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按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企业填报。^[27]与文献中广为应用的工业企业数据库相比，“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有以下三方面的优势。^{[28][29]}首先，“全国税收调查”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而工业企业数据库则由地方统计局报送给国家统计局。由于涉及企业的纳税情况，其数据质量相对更高，记录更为准确。其次，“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覆盖的样本更广泛，更具有代表性。其涵盖了众多销售额 500 万元以下（2011 年起为 2000 万元以下）的非规模以上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其中大多为中小微企业。这类企业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组成部分，也是“减税降费”的重点对象。最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的样本跨越了金融危机前后，而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可用的样本则主要集中在 2007 年以前，无法用于评价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企业层面的反应。2008 年以后，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结果可能不再适用于当前的经济“新常态”。

（二）变量定义

本文主要分析浙江省基本养老保险降费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的实际缴费率、雇佣水平、投资及研发行为。从微观数据层面对参保概率和实际缴费率进行测算。定义参保概率 (Participation)：当计提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大于 0 时，取值为 1，否则为未参保企业，取值为 0。

政策缴费率主要通过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网站上公布的相关政策文件进行测算。对于地方网站上未公布相关文件的情况，则采用电话调查的形式进行收集。目前，已经收集到了全国各省市级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率。本文使用该数据验证浙江省在 2008 年 11 月出台的社保降费政策是否的确降低了政策缴费率，以确认实验环境的有效性。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 (EndowRate) 的计算公式如下：

$$\text{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 = \frac{\text{全年计提的基本养老保险费}}{\text{全年计提的工资及奖金总额}} \times 100\%$$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计算出的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并不等于真实的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水平。第一，企业在根据会计科目和凭证填报时会出现遗漏和偏差。由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中包含的被调查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会计制度不健全，缺失值较多。第二，由于担心税务稽查等原因，存在问题的企业在填报时会倾向于虚报数据。第三，公式中使用的是计提的数据而非实际发放的数据。

封进（2013）用实际缴费率与政策缴费率的偏离除以政策缴费率度量企业参保程度。^[4]虽然此指标可以在不同政策缴费率地区的企业间进行直接比较，但是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数据本身存在系统性误差，本文所计算的实际缴费率并不是真实的缴费率，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出的遵从度也不是真实的企业遵从度。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测量缴费遵从度（Compliance）的改进方法：

$$\text{企业养老保险缴费遵从度} = \frac{\text{企业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text{当地大型国有企业的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 \times 100\%$$

由于国有企业逃避缴纳社保的动机较小，因此假设国有企业在为员工缴纳社保时是完全遵从的，那么就以当地大型国有企业的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作为基准，这样能够减轻由于数据中的系统性误差而导致的遵从度衡量不准确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测算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的目标并不是精确测算出具体的数值，而是着眼于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的趋势，以确定政策缴费率的下降的确传导至了实际缴费率，并且控制组和对照组在实际养老保险缴费率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上述的系统性误差并不会影响结果的可靠性。

人均薪金 (avg_wage) 为计提的工资和奖金总数除以年平均职工数；我们使用固定资产投资率 (FAIRate1) 来衡量企业的投资行为，该指标定义为企业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年初固定资产存量的百分比。同时，我们也关注降费对于就业的影响，因为降费这一有利政策理论上降低了劳动力成本，有利于就业的增长。我们定义劳动投入 (Labor) 为企业年平均职工数的对数值。由于不同的企业特征会影响企业在面临政策缴费率下降时的反应，也会影响到其工资、雇佣和投资水平，若不加以控制这些特征则会影响估计结果的一致性。首先，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可能有足够的能力为职工足额缴纳社保，因此有必要控制企业规模 (Size)，以企业期初总资产的对数表示。其次，企业的内源性融资能力会影响企业的流动性水平，而高现金流的企业更有能力足额且及时为职工缴纳社保，并在拥有合适的投资机会时扩大对固定资产和研发的投资水平。而低流动性的公司则没有能力扩大投资。因此，本文使用经过年初资产存量调整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衡量企业现金流 (Cash)，以控制内源性资金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资产负债率低的企业更有希望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外部资金支持，以此增加资本类要素投入，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因此我们也控制了资产负债率 (Leverage)。再次，因为融资成本对企业的要素使用十分重要。本文使用财务费用与负债余额的比值衡量融资成本 (Fcost)。由于财务费用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为筹集资金而发生的筹资费用，因此单位负债的财务费用可以作为融资成本的代理指标。最后，我们根据企业是否存在出口货物销售额判断企业是否有出口业务，若有出口业务，则 Export 等于 1，否则为 0。本文对实证研究中需要使用的变量进行了数据清理，删除了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和分布极端的观测值。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量。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Participation	233612	0.788	0.409	1	0
EndowRate	233612	0.078	0.082	0.4	0
Compliance	233612	0.415	0.502	1	-0.884
Lnavgwage	233612	3.166	0.696	9.393	0.693
FAIRate	233612	0.171	0.231	1	0
Labor	233612	4.154	1.301	9.886	1.099
Size	233612	10.24	1.824	18.59	5.881

Cash	233612	0.089	0.461	1	-1
Leverage	233612	0.652	0.296	2	0.024
Fcost	233612	0.022	0.032	0.5	0

五、实证分析

（一）对企业参保行为的影响

本文首先考察全样本下浙江企业的参保概率、实际缴费率和遵从度在浙江省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后的变动情况。基准回归结果报告见表 3。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参保概率	(2) 已参保企业实际缴费率	(3) 所有企业实际缴费率	(4) 遵从度
Post*Treat	0.026*** (0.003)	-0.011*** (0.001)	-0.012*** (0.001)	0.061*** (0.005)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233612	233612	233612	233612
R-squared	0.124	0.118	0.083	0.093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已参保企业的实际缴费率和所有企业的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在降费前的均值分别是 0.095 和 0.082，在 2008 年 11 月下调政策缴费率后其实际缴费率分别下降 0.011 和 0.012，降幅分别达到 11.58%和 14.63%。值得注意的是，平均政策缴费率从 0.17 下降至 0.14，降幅为 17.6%，实际缴费率的降幅低于政策缴费率的降幅，说明政策缴费率的下降并没有完全传导至企业的实际缴费率上。假设样本企业在 2008 年 11 月政策缴费率下调前后的遵从度不变，那么政策缴费率的下降应该基本上传导至实际缴费率上。但是，表 3 中的结果显示，政策缴费率的下降并没有完全传导至企业的实际缴费率上，可能的路径有二。第一，企业自愿遵从水平上升。当政策缴费率下降后，由于缴纳养老保险的成本降低，企业自愿为部分职工缴纳了养老保险。第二，迫于稽查压力导致遵从水平上升。企业在当地政府由于社保基金的紧张而进行社保扩面工作，加大稽查力度后企业被迫为更多的职工缴纳了养老保险。

由于数据限制，我们无法区分企业是自愿遵从水平上升还是迫于稽查压力导致遵从水平上升。但我们可以通过表 3 第（4）

列的结果得出企业养老保险缴费遵从度的确较降费前的均值 0.507 显著增加了 0.061，增幅达到 12.03%，说明降费后企业的遵从度大大提高。这也解释了为何实际缴费率的降幅低于政策缴费率的降幅，同时说明降费促进了企业为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遵从度。

（二）对薪资、职工人数和企业投资的影响

为了考察降费后企业在人均薪资、职工人数和企业投资方面的变化，参照基准回归模型，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相关变量。理论上，降低基本养老保险费率，会降低雇佣劳动力的成本，导致劳动力成本相对于资本的下降，可能刺激企业雇佣更多的员工；降费也可能促使企业将原本用于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资金发放给员工。如表 4 所示，在实施降费政策后，企业雇佣人数没有显著增加，人均职工薪金显著上涨了 8.3%，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投入率提高了 0.015，较降费前的均值 0.139 约上升了 10.79%，说明企业的投资活动对于降费政策十分敏感。

表 4 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1) Ln_人均薪资	(2) Ln_职工人数	(3) 固定资产投资率
Post*Treat	0.083*** (0.006)	-0.004 (0.009)	0.015*** (0.002)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233,612	233,612	233,612
R-squared	0.302	0.523	0.02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六、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一）稳健型检验

本部分首先对上文的一系列结论进行稳健型检验（见表 5）。

表 5 稳健性检验

	广义精确匹配	平衡面板	剔除上市企业	剔除出口企业
参保概率	0.021***	0.022***	0.026***	0.005

	(0.004)	(0.005)	(0.003)	(0.005)
参保企业的实际缴费率	-0.012*** (0.001)	-0.011*** (0.001)	-0.011*** (0.001)	-0.013*** (0.001)
实际缴费率	-0.013*** (0.001)	-0.010*** (0.001)	-0.012*** (0.001)	-0.017*** (0.001)
遵从度	0.069*** (0.006)	0.044*** (0.009)	0.061*** (0.005)	0.084*** (0.007)
Ln_A 均薪资	0.073*** (0.006)	0.030*** (0.009)	0.083*** (0.006)	0.101*** (0.009)
Ln_职工数	0.008 (0.010)	-0.087*** (0.015)	-0.004 (0.009)	0.032** (0.013)
固定资产投资率	0.016*** (0.002)	0.014*** (0.004)	0.015*** (0.002)	0.010*** (0.003)

注：表格中只报告了双重差分项(Post*Treat)的回归结果。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第一个问题是双重差分要求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冲击前具有可比性，我们使用广义精确匹配方法 (Coarsened Exact Matching)，可以通过控制观测数据中混杂因素对政策结果影响使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协变量的分布尽可能保持平衡，从而增强两组数据之间的可比性，第一列结论与基准回归一致，说明本文双重差分模型设定稳健。第二个问题是企业进入和退出可能影响估计结果。比如，2009 年新进入的企业本来就面临较低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我们保留在 2007—2011 年都存在的企业作为子样本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列的结论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第三个问题是上市企业的社保缴纳本身较为规范，遵从度较高，不容易受到降费政策的影响。因此，剔除上市企业后，我们更能准确地识别那些遵从度较低的企业如何受到政策缴费率下降的影响，相关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第四个问题在于样本时间跨越了 2008 年经济危机前后，期间出口企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由于浙江和江苏省的出口经济模式存在差异，我们需要剔除出口型企业以控制 2008 年经济危机的冲击差异。剔除出口企业后发现样本企业的参保概率没有提升，参保企业的实际缴费率下降，主要回归结果系数与基准回归一致，说明本文的结论在剔除出口型企业后仍然稳健。

（二）异质性分析

1. 企业的所有制的异质性分析。首先，社保降费之前不同类别的企业社保遵从度不同、社保负担不同，或者遭遇不同的发展瓶颈，因而降费对其影响的程度甚至方向都会有所不同；其次，要了解降费对于企业职工薪资、雇佣和投资活动的影响，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提高政策施行的准确性，需要精准地掌握减税的政策会以何种方式、多大程度地影响哪类企业。

从对企业参保行为的影响来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 2008 年 11 月降费前的实际缴费率均值分别为 0.114 和 0.080，降费后分别下降了 0.020 和 0.008，降幅分别为 17.54%和 10%。同时，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的遵从度没有显著变化，而非国有企业的遵从度的均值从降费前的 0.502 增加了 0.064，增幅达到 12.75%，这一结果说明政策缴费率的下降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参保行为有着极其不同的影响。对国有企业而言，政策缴费率下降后实际缴费率的降幅几乎和政策缴费率一致，这说明降费前

后其遵从度没有变化，对遵从度回归其系数不显著也印证了这一判断。由于国有企业特殊的所有者性质，存在预算软约束，且目标函数与非国有企业存在不同，逃避缴费的动机较小，遵从度较高，政策缴费率下降自然无法通过遵从度这一渠道产生影响；对非国有企业而言，其实际缴费率的降幅远远低于政策缴费率，说明企业缴费遵从度在政策前后发生了变化，对遵从度回归的结果说明政策缴费率的下降通过遵从度的渠道影响了实际缴费率，证明政策缴费率的下降的确有效地提高了非国有企业的遵从水平，大大减少了企业在为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时的不合规行为。

从人均薪资、职工人数和企业投资方面来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 2008 年 11 月降费后的人均薪资均有提升，但国有企业更多地提高了雇佣人数水平而非国有企业则更多地提高了人均薪资水平和投资水平。这可能与非国有企业更为灵活的薪酬体系和更加迅速的投资决策有关，说明政策缴费率的下降刺激了企业的投资活动，增强了经济活力；而国有企业则在降费后大规模地增加了其雇佣职工人数，考虑到其所有制性质和金融危机的背景，说明在降低政策缴费率后，国有企业将节约的资金更多地投入在劳动力上，体现了其特殊的社会责任，实现了稳就业的政策目标。

表 6 异质性分析：按企业所有制划分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参保概率	0.083*** (0.015)	0.022*** (0.003)
参保企业的实际缴费率	-0.023*** (0.005)	-0.007*** (0.001)
实际缴费率	-0.020*** (0.005)	-0.008*** (0.001)
遵从度	0.033 (0.028)	0.064*** (0.005)
Ln_人均薪资	0.064* (0.037)	0.090*** (0.006)
Ln_职工数	0.103** (0.051)	-0.003 (0.009)
固定资产投资率	0.012 (0.010)	0.015*** (0.002)

注：表中只报告了双重差分项(Post*Treat)的回归结果。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2. 由于规模越大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现金流更为充裕，进而可能会影响企业在面临社保降费后的反应。社保降费的反应一般有两个路径：一是要素市场，例如劳动力、资本等；二是产品市场，企业可能调整产品价格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在中国，非国有企业在产品市场上一般不具有垄断优势，我们假定其面临的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因此社保降费更多地反映在要素市场上。本文将民营企业中的非小微企业^⑥按照规模三等分，以控制社保降费在产品市场上的反应而研究其在要素市场上的反应。

从对企业参保行为的影响来看，小、中和大规模企业在降费前的实际缴费率均值分别为 0.060、0.075 和 0.080，降费后其实际缴费率分别下降了 0.014、0.011 和 0.007，降幅分别为 23%、14.6%和 8.75%；遵从度在降费前的均值分别为 0.525、0.400 和 0.355，遵从度在降费后分别提高了 0.075、0.074 和 0.059，增幅分别为 14.29%、18.5%和 16.6%。总体而言，规模越大的民营企业在降费后越倾向于更为规范地为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可能的解释有：（1）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配合稽查部门检查，迫于压力为更多的职工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2）自愿为更多的职工按照规定缴纳社保，由于政策缴费率下降而降低了缴纳社保的成本，规模越大的企业现金流更为充裕，更有能力按照规定缴纳足额社保。

此外，我们发现只有小规模企业显著提升了人均薪资水平，其他规模类型的人均薪资、职工人数和固定资产投资率均对降费不敏感。可能的解释是，小规模企业节约了更多的资金，因此可以提高职工的工资；而其他企业在降费后的遵从度上升较大，实际缴费率的降幅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大，因此没有反映在人均薪资、职工人数和企业投资上。

表 7 民营企业异质性分析：按企业规模

	小规模企业	中等规模企业	大规模企业
参保概率	-0.028* (0.014)	0.001 (0.013)	0.012 (0.012)
参保企业的实际缴费率	-0.012*** (0.003)	-0.011*** (0.002)	-0.007*** (0.002)
实际缴费率	-0.014*** (0.003)	-0.011*** (0.002)	-0.007*** (0.002)
遵从度	0.075*** (0.017)	0.074*** (0.017)	0.059*** (0.019)
Ln_人均薪资	0.093*** (0.021)	0.008 (0.017)	0.027 (0.020)
Ln_职工数	-0.031 (0.027)	0.016 (0.031)	-0.042 (0.033)
固定资产投资率	0.009 (0.009)	0.008 (0.008)	-0.001 (0.009)

注：表格中只报告了双重差分项(Post*Treat)的回归结果。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发现 2008 年 11 月浙江省降费政策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从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由于本身缴费遵从度较高，政策缴费率下降几乎完全传导至了企业的实际缴费率上。由于降费前后的缴费遵从度不变，国有企业在降费后并没有将节约的资金用于更为合规地为职工购买基本养老保险上，而是增加了雇佣职工的人数，这说明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出台的社保降费政策实现了稳就业、促投资的既定目标。而非国有企业由于在降费前的缴费遵从度相对较低，其或出于自愿或出于监管压力将节约的资金部分用于更为遵从地为其职工购买基本养老保险上，缴费遵从度大幅度提高，同时也将部分节约的资金用于提高职工工资奖金，但没有提高其雇佣水平。从企业规模来看，在控制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反应后，我们发现规模越大的民

营企业在降费后其缴费遵从度提升得越高，但在要素市场上却没有显著的反应。总之，本文认为，2008年11月浙江省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下降后可能在参保行为和要素市场上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相互替代的。若企业大幅度提高社保缴费的遵从度，则节约的资金就会更多地用于缴纳社保，而更少地流向要素市场，其人均薪资、职工数和投资水平反应会较小；若企业的遵从度变化较小，则企业会将节约的资金更多地投入在要素市场上，其人均薪资、职工数和投资水平反应会较大。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分析了浙江省在2008年11月出台的基本养老保险降费政策的影响，以评估目前的“减税降费”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降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缴费的遵从度这一途径对企业的参保行为产生影响。我们的主要结论有：（1）降低政策缴费率使得企业参保遵从度上升，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和大规模的民营企业；（2）降低政策缴费率对企业人均薪资和投资水平均有正向影响，达到了稳就业、促投资的政策目标。其中，国有企业雇佣了更多的职工而非国有企业提高了职工工资和投资水平。

在当前“共同富裕”与“减税降费”的政策背景下，本研究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本文发现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的下降可以大幅增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这对于保障职工权益、扩大社保基金收入都有积极作用；第二，本文发现，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的下降也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和非国有企业的人均工资和投资水平，这有助于达到稳就业、促投资、增强非公有制经济活力的政策预期，也为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实证证据。

注释：

①原行业统筹企业指：中央部属驻浙的铁路、邮电（邮政、电信）、电力、民航、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人保公司、寿保公司）、交通、石油等行业中（以下简称原行业）的各类企业（包括国有集体企业等）及其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所有职工（包括固定工、城镇合同工、农民合同工和临时用工、企业退休人员）。

②大型国有企业是指年末总资产排在样本前20%的国有企业。

③这里的小微企业是指小型微利企业，划分标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剔除小微企业的原因是其大多没有规范的财务体系，为了提高数据的准确性我们在样本中剔除了小微企业。

参考文献：

[1] 申广军, 陈斌开, 杨汝岱. 减税能否提振中国经济?——基于中国增值税改革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16, 51(11): 70-82.

[2] 苏中兴. 基本养老保险费率: 国际比较、现实困境与改革方向[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6, 30(01): 20-27.

[3] Feldstein M S, Liebman J B.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an Investment-Bas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J]. NBER Working Paper No. w7492, 2000.

[4] 封进. 中国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参与激励[J]. 经济研究, 2013, 48(07): 104-117.

[5] 赵静, 毛捷, 张磊. 社会保险缴费率、参保概率与缴费水平——对职工和企业逃避费行为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季

刊), 2016, 15(1):341-372.

[6] 金刚, 范洪敏. 社会保险政策缴费率调整对企业实际缴费率的影响——基于深圳市 2006 年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调整的双重差分估计[J]. 社会保障研究, 2018(4):56-68.

[7] Leung J C B. Social Security Reforms in China: Issues and Prospec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03, 12(2):73-85.

[8] 周小川. 社会保障与企业盈利能力[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0(6):1-5.

[9] 封进, 张素蓉. 社会保险缴费率对企业参保行为的影响——基于上海社保政策的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12, 24(3):47-55.

[10] 伍青生, 钟展. 用工企业为农民工缴纳保险的意愿与激励机制研究——基于对长三角用工企业的调查[J]. 保险研究, 2010(5):64-71.

[11] 马双, 孟宪芮, 甘犁. 养老保险企业缴费对员工工资、就业的影响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14, 13(3):969-1000.

[12] 赵健宇, 陆正飞. 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会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吗?[J]. 经济研究, 2018, 53(10):97-112.

[13] 钱雪亚, 蒋卓余, 胡琼. 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规模的影响研究[J]. 统计研究, 2018, 35(12):68-79.

[14] Gruber J, Krueger A B. The Incidence of Mandated Employer-Provided Insurance: Lessons from 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J]. Tax Policy and the Economy, 1991, 5:111-143.

[15] Lai Y C, Masters S. The Effects of Mandatory Maternity and Pregnancy Benefits on Women's Wages and Employment in Taiwan 1984-1996[J]. ILR Review, 2005, 58(2):274-281.

[16] Nielsen I, Smyth R. Who Bears The Burden of Employer Compliance with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 Level Dat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7, 19(2):230-244.

[17] Hall R E, Jorgenson D W. Tax Policy and Investment Behavior[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3):391-414.

[18] Benzarti Y, Harju J, Matikka T. Does Mandating Social Insurance Affect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2020, 2(2):255-268.

[19] Falk A, Huffman D. Studying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in the Lab: Minimum Wages, Employment Protection, and Workfare[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2007, 163(1):30-45.

[20] Hsu P H, Xuan T, Yan X.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Cross-Country Evide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4, 112(1):116-135.

[21] Krishnan K, Nandy D K, Puri M. Does Financing Spur Small Business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5, 28(6):1768-1809.

[22] Akerlof G A, Yellen J L. The Fair Wage-Effort Hypothesis and Unemploymen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0, 105(2):255-283.

[23] 林炜. 企业创新激励:来自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解释[J]. 管理世界, 2013(10):95-105.

[24] 刘军强. 资源、激励与部门利益:中国社会保险征缴体制的纵贯研究(1999—2008)[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3):139-156, 223.

[25] 李永友. 金融危机下的工业经济发展困境:内因抑或外因——基于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四省工业经济的比较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9(3):20-30.

[26] 唐珏, 封进. 社会保险征收体制改革与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基于企业缴费行为的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19, 18(3):833-854.

[27] 高培勇, 毛捷. 间接税税收优惠的规模、结构和效益:来自全国税收调查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12):143-155.

[28] 宋弘, 封进, 杨婉彧. 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社保缴费与劳动力雇佣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21, 56(1):90-104.

[29] 赵绍阳, 周博, 余楷文. 社保政策缴费率与企业实际参保状况——以养老保险为例[J]. 经济科学, 2020(4):111-124.